

THE RECONSTRUCTION OF
VALUE AND ORDER

价值与 秩序的重建

张曙光 等/著

 人民出版社

THE RECONSTRUCTION OF
VALUE AND ORDER

价值与 秩序的重建

张曙光 等/著



人 民 出 版 社

责任编辑:夏 青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价值与秩序的重建/张曙光 等著.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5
ISBN 978-7-01-016017-7

I. ①价… II. ①张… III. ①价值(哲学)—关系—文明—研究
IV. ①B018②G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056322 号

价值与秩序的重建

JIAZHI YU ZHIXU DE CHONGJIAN

张曙光 等著

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北京盛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16 年 5 月第 1 版 2016 年 5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71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张:32.25

字数:485 千字

ISBN 978-7-01-016017-7 定价:75.00 元

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 (010)65250042 65289539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凡购买本社图书,如有印制质量问题,我社负责调换。

服务电话:(010)65250042

目 录

引 论 价值与秩序重建的思想任务.....	1
第一章 价值与生活世界.....	60
第一节 价值与“善”.....	60
第二节 价值与“应当”.....	67
第三节 价值与“目的”.....	81
第四节 生活的价值与道理.....	101
第五节 价值观与生活方式.....	115
第二章 秩序与社会历史秩序.....	130
第一节 秩序与道.....	130
第二节 秩序与规则.....	139
第三节 秩序与文明.....	150
第四节 社会历史秩序的变迁.....	157
第三章 文化与作为价值的文明.....	171
第一节 人类文化的生成与文明.....	171
第二节 文化的传承与文明的转换.....	184
第三节 中国传统文化和文明的近代演变.....	198
第四章 社会主义的“社会”与“个体”.....	212
第一节 人的社会化与个体化.....	212

第二节	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	221
第三节	社会主义的历史演进与价值变迁	228
第四节	社会主义的现代重塑	242
第五章	从传统家国转向新的民族共同体	249
第一节	中国传统价值观念及其衰微	249
第二节	家国伦理向现代民族意识的转换	264
第三节	自由民族主义与社会主义	273
第四节	社会悖论的化解之道	285
第六章	市场经济与现代社会秩序	291
第一节	市场的基础作用与政府	291
第二节	市场经济与市民社会的兴起	297
第三节	市场、社会与政府的关系	310
第四节	从政治权威到法治权威	317
第七章	现代社会的自由与平等	327
第一节	自由与平等的双重追求	327
第二节	自由、平等与群己权界	346
第三节	权利与善的优先性问题	367
第四节	社会公正与全球正义	376
第八章	现代价值及其虚无问题	385
第一节	现代价值及其特点	385
第二节	现代价值中的虚无问题及其本质	392
第三节	价值虚无主义的解决之道	400
第四节	重建价值和意义的尝试	410
第九章	社会转型与公共理性	421
第一节	社会转型的时代语境	421

第二节 现代社会转型的价值变奏	430
第三节 公共理性的反思与建构	442
 第十章 “天下为公”：道德价值与政治秩序	458
第一节 中国传统的“天下”观与“王道”	458
第二节 儒家道德理想与现实皇权政治的纠结	467
第三节 中国传统社会的基本矛盾及解决之方向	475
第四节 一与多：道德与政治的分化与整合	487
 主要参考文献	494
后 记	509

引论 价值与秩序重建的思想任务

本书所要研究和阐述的是中国如何走向社会的优良秩序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当代文明秩序建构的关系问题。在我们今天所重视的价值和秩序问题的背后，蕴含着涉及中西古今各方面的关系及其变化的根本性矛盾。现代中国许多带有普遍性的社会现象和问题，一方面源于中国自身的自然历史条件和传统，另一方面又是在西方主导的世界历史运动中诱发、激化、暴露出来的。而在各民族的互依性和命运的共通性越来越强化的趋势下，任何国家的发展及社会秩序，都离不开人类各民族之间越来越密切地交往和互动。因此，我们只有深入到近代以来中国社会的巨大历史变迁中，才能弄清发生于现代中国社会的价值和秩序问题的性质及来龙去脉，才能揭示出早已呈现为多元化的人们实际的价值取向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整个社会发展的关系，揭示出中国在市场经济发展以及由此推动的社会分化与整合的基础上走向良好秩序的逻辑。

因而，本书所要研究的问题，根本上属于处在世界历史进程的中华民族的现代命运与使命的论题，这一论题关涉着近代以来由西方文化冲击所导致的中国三千年未有之巨变，关涉着中国现代化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所形成的新的社会现实及其矛盾，也关涉着当代人类世界正在发生的变化与要求。论题的广度与深度，规定了本书的研究理应达到的思想和理论的广度与深度。我们把这一研究的宗旨确定为“价值与秩序的重建”，也是“文明的重建”，依据的是如下认知和信念：经过长达一个半世纪的社会大变动和三十余年的改革开放，今天的中国与西方主导的世界已经有了全面的交往和多方面的融通，既充分利用资本的作用又倡导共同富裕的目标，既传承自身的文化又广泛吸取现代文明元素，经济社会各方面的现代化进程已不可逆转；依

宪治国和建设法治国家的基本方略的明确,标志着中国正待走向现代法治社会的历史新纪元。中国在总体上已经跨进现代国家的大门。然而,我们也必须清醒地认识到:中国尚未完全走出最为艰难的社会转型期,^① 社会的发展仍然面临着各种势力的博弈和某种不确定性,尤其显著的是与“共同富裕”相去甚远的贫富悬殊和相当普遍的社会溃败现象,现实仍然存在着两种相反的可能性。因而才需要我们严肃地对待,深入地剖析和把握社会的矛盾,利用国内外的一切积极因素推动现代化事业的进步。而价值与文明秩序的重建,正是其中一项根本性任务。

在中国现代化事业背后发挥着支配作用的,是下述历史性的逻辑:由西方资本主义所主导的现代世界严重的不平衡和冲突,以时空双重挤压的形式降临到东方,降临到中国大地上,使中国社会在面临千载难逢的历史大转折机遇的同时,也产生一系列严重的悖论。当着20世纪初一批先进的中国知识分子选择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指导思想,将社会主义作为奋斗目标时,就将中国社会的变革与发展置于现代“世界历史”运动的巨大张力之上,从而决定了中国面临着两种可能的命运:深刻地理解并正确地利用这个巨大的张力,中国就会比较顺利地实现社会转型,实现现代化;否则,中国的社会转型和发展就会遭遇重大的挫折,甚至有走向崩溃或全面溃败的可能。如果说在过去的岁月里中国经历了这两种命运的反复交织,那么,改革开放以来的实践则证明中华民族越来越自觉地把握住这一巨大的张力,已经并仍在使其作为中国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和面向未来的强大动力。尽管我们仍然困扰于严重的体制性问题,社会现实的政治、经济与文化还具有明显的矛盾性与过渡性的特征,国内外的利益博弈与观念冲突更将长期存在,未来还存在着

① “现代化”是一个综合概念,主要来自于19—20世纪研究后发国家从传统到现代变迁的现代化理论,这个理论对于现代化的认识有一个不断深化的过程。“社会转型”主要是一个社会学概念,指从传统社会到现代社会所发生的结构性、制度性变化。我们过去所重视的“现代化”即著名的“四个现代化”,主要关乎器物,后来认识到人的现代化和制度的现代化更为重要,并重视研究“现代性”和“后现代”问题,同时针对当代中国大陆的社会变迁提出“社会转型”的任务,这表明我们关于中国大陆现代化的认识在不断深化和具体化。参见金耀基:《从传统到现代》,台北时报文化出版事业有限公司1988年版;罗荣渠:《现代化新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苏国勋、刘小枫:《社会理论的诸理论》,上海三联书店2005年版。

许多不确定的因素，但是，这一切已经处于新的历史条件下，社会各方特别是执政者和掌握一定权力者应当也能够以新的方式合理地看待与解决各种矛盾和问题。

价值与秩序的重建作为现代中国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关乎整个社会各领域的文明规则与行为规范的确立，关乎所有中国人的道德和精神世界的全面拓展和提升，具有“人文价值”和“社会规则”的双重规定性。就前者而言，它必须完成并凭借中国传统的“仁道”与现代“自由”“平等”价值的整合；就后者而言，它必须深刻理解“现代社会”的性质即现代性及其在中国的实现方式，并诉诸于经济与政治的实践。如果说前者属于“文化建设”，后者则属于广义的“社会建设”，双方相辅相成。由此，它既要充分吸收和发扬中外优秀的思想文化，又植根于中国历史传统和人们现实的生活实践，需要社会各方面的建设和良性互动，包括思想理论界的积极参与和引导。我们认为中国的价值与秩序重建，大致要经历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社会转型。在中国社会转型的过程中，虽然出现了各种严重的问题，但在总体上越来越呈现出有序性，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初明确建构市场经济体系以来，在行政和经济上“一放就乱、一收就死”的情况已经大大好转。然而，这种有序性是我们基于历史的惨痛教训，围绕以发展经济为中心的目标，“摸着石头过河”，努力避免自我折腾，不断总结经验教训，在中国与西方、现代与传统之间努力做到“执两用中”，在稳定、改革与发展之间统筹兼顾、综合治理所实现的“动态平衡”。显然，这种动态平衡的达到，主要借助的是开明威权和经济发展所带来的政治合法性，借助的是政策而非制度和法治的保障，具有相当大的脆弱性。

第二个阶段是在社会各方面发展特别是经济发展的基础上，由执政党提出并由全社会参与的“现代文明秩序”的建立。当前的社会治理，由于面临“矛盾风险挑战前所未有”，一时难以离开过去行之有效但原则上已经过时的社会领导或管理方式，然而，从根本上说，社会各方所要做的是凭借宪法和法治，凭借实质正义通过形式正义的程序，治理国家、规范权力，终结“人治”以及“权大于法”、“情大于法”的传统，大力推进经济、政治与文化之间的合理分化与良性互动，消除官本位，形成富有生机与活力的大社

会；也包括凭借文化的传承与创新，来实现建立现代文明秩序的目标。这一现代文明秩序将是中国传统的“仁道”与西方现代“自由”“平等”相融合的价值秩序，因而也是多样而和谐、理性而又富于人文关怀的秩序，同时也是中产阶层占人口绝大多数的椭圆型社会应有的秩序。应当说，我们今天正在进入这个阶段。

第三个阶段是使全社会达到“和而不同”的自由秩序，那将很可能是再经历数代人奋斗之后的局面。

这无疑是一项复杂且困难的事业，即使第二个阶段也不是搞一两个“五年计划”就可以大功告成的。这里首先需要对历史和现实中存在的价值与秩序方面的问题，在理论上作出深入的研究，厘清基本事实，总结经验教训，充分调动各种思想和学术资源，确立一种具有普遍涵盖性与解释力的思想方式和理论框架，提出立足中国而又具有世界意义的新理论。而最忌讳的是在事实不清、逻辑不明的情况下，凭自己的好恶先行给予“价值判断”。为此，我们将本书定位于社会历史哲学的研究，侧重探讨基本理论问题而非对策性研究，在方法论上则力求多方面地运用学术资源，将哲学与社会科学及思想史结合起来，将理论上的逻辑展开与现实经验的分析结合起来开展研究。



中国近代以来巨大的历史变迁，根本上是社会价值与秩序的变化。我们先就此作一简略的回顾和分析，以便总结出基本的经验。

我们知道，虽然中国传统的思想文化中并无价值和价值观这样的概念和提法，^①但对价值特别是道德价值的重视，却是中国传统社会的一大特点。从《易经》“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易经·革卦》）的顺天应人的观念，到《尚书》“天命靡常，唯德是辅”（《尚书·多士》）的重德思想的提出，

① 中国古汉语有“价”与“值”的词汇，主要指物之价格，对等与相等，也有重要性的含义。

再到《管子》“以人为本”（《管子·霸言》）和“仁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管子·牧民》）的命题的提出，特别是儒家在汉朝被定于一尊之后，“仁义道德”、“忠孝节义”等价值观念不仅广泛流行开来，并且以“礼”和“礼教”的形式得到规范化、制度化，成为世人必须遵守的行为准则。如果说，“仁义礼智信”是世人最为重视的“五常之道”，那么，“天地君亲师”则构成中国人所信仰的意义世界。^① 就为学而言，差不多西汉以来两千年的历史上，“德性之知”优于“见闻之知”，“尊德性”高于“道问学”，越是到后期就越是如此。^② 由此导致中国人待人接物、把握问题的一个特点是“价值判断”往往先行于“事实认知”。由于传统中国人的价值判断直接凭借的是他们在日常生活中形成的实用理性和习惯，这在以家庭和家族为本位、人们的交往范围比较有限、各方面变化都比较缓慢的传统社会，不会产生太大问题。但进入近代以来，我们越来越面临着一个陌生的世界，中国自身也发生急剧的变化，这种思想习惯对我们理性地客观地看待和处理问题，就越来越表现出负面的影响，因而也在实践中逐渐受到我们自己的重视和矫正。

中国传统的意义世界在中国被拖入近代世界历史的过程中，随着西方廉价商品和鸦片在坚船利炮的护卫下一起涌入中国，随着清帝国的风雨飘摇和最后被推翻，随着科学知识对天地万物的祛魅而逐渐瓦解，普通民众只有凭借长期积淀在内心的是非善恶的判断力和良知、凭借基于血缘本能的“亲”和若存若亡的“师”，维系着人际关系和社会不至于彻底溃败。然而，人生是不能没有价值和意义的，社会大变革更会激发人的思想情感和意志，在传统的道德价值分崩离析的同时，各种各样的价值观纷至沓来。中国近现代史上先后发生的洋务运动、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五四

① 参见余英时：《中国思想传统及其现代变迁》，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71—74页。

② “尊德性而道问学”，语出《中庸》。至朱熹与陆九渊，遂有关于两者关系的争辩。如元代理学家吴澄所言：“朱子道问学功夫多，陆子静却以尊德性为主。问学不本于德性，则其弊偏于言语训释之末。果如陆子静所言矣，今学者当以尊德性为本，庶几得之。”（转引自方旭东：《尊德性与道问学：吴澄哲学思想研究》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246页）后来的阳明心学就是对陆九渊这一思想的发扬光大。

运动、北伐战争、抗日战争、国共内战等重大的历史活动和事件，都有某种价值观发挥着引导和鼓动作用，而这些活动和事件的成功或失败，又会产生重大的广泛的社会影响，特别是对人们思想和行为的影响。从总体上看，在清末和民国时期，有两种价值观是最具持久的影响力的：一是来自于西方的主张“自由”、“平等”、“科学”、“民主”、“进步”的现代价值观；一是中国传统的“仁义”观、“天下”观与从西方传入的“世界”观、“民族”观结合而成的“道义”观与“公理”观，后者最后演化为具有理论形态的“爱国主义”、“民族主义”和“国际主义”。

当中国共产党选择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并将社会主义作为其奋斗目标时，她就将中国社会的变革与发展置于现代“世界历史”运动的巨大的张力之上。中国共产党对上述两种价值观都有贡献和继承，并将其统一到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实践之中，成功地进行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当把国民党赶到台湾并建立新的政权之后，中国大陆的人民曾经欢呼雀跃，对新政权的感激、信任和对未来的期盼与希望，让人们的精神风貌和社会面貌为之一新。

但是，对于西方率先进入的现代社会，对于现代资本主义和市场经济，尤其是对于比资本主义还要优越的社会主义社会形态以及在中国这样落后的农业大国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无论是当时的民主人士还是中国共产党人，大都缺少明确的、系统的认识。尽管如此，在当时的国际环境特别是苏联“老大哥”的示范与带动下，我们快速地走上了社会主义国家化和集体化的道路，采取了消灭资本主义与市场经济的措施，对民主革命时期高举的“自由民主”的旗帜，也将其作为已经过时的资产阶级革命的意识形态，丢弃一旁。然而，这已经意味着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中共的领导对于世界历史的巨大张力的理解和把握发生了严重偏差。那么，除了上述原因，包括当时中共领导层在社会发展问题上所出现的“急躁冒进”的问题，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社会意识和文化心理起着主导作用？

我们知道，在以汪洋大海般的小农作为主体的传统中国社会，作为小生产者的农民朴素而又不无狭隘的人生观和道德观，与宗法社会的大家长意识，共同构成了传统社会意识的主流。这一社会意识在社会和文化价值层面的表现，是源远流长的君主崇拜、官僚主义、民本意识和平均主义的混合。

如果撇开宗教不谈，这与农民占人口绝大多数的俄国的国情有许多接近之处。当然，在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和接受来自于西方的现代文明方面，中国还远不如俄国。在俄国，许多知识分子包括革命者在道德上和政治上高度认同处于社会底层的农民，并形成“民粹主义”思潮，对俄国的革命和社会发展产生了很大影响。^①中国虽然没有“民粹主义”的概念和政治派别，但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和政治思潮，同样广泛地存在。

深受欧洲文化和文明影响的列宁，曾针对俄国的民粹派反对理性启蒙、反对在俄国发展资本主义给予这样的批评：“启蒙者是热烈地相信当前的社会发展的，而民粹派却不相信它；启蒙者满怀历史的乐观主义和蓬勃勃勃的精神，而民粹派则悲观失望和垂头丧气，……主张落后是俄国的幸福的理论等等。”“民粹主义在一定程度上是一种完整的前后一贯的学说。它否认资本主义在俄国的统治；鼓吹立刻从小农经济的农民村社出发来实行社会主义革命，……在民粹派看来，农民运动正好驳倒了马克思主义，它正好是有利于直接的社会主义运动。”^②列宁还认为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与俄国民粹派的许多认识都是类似的，所以在给予某种肯定的同时批评道：中国民粹主义者的“这种战斗的民主主义思想体系，首先是同社会主义空想、同使中国避免走资本主义道路、即防止资本主义的愿望结合在一起的，其次是同宣传和实行激进的土地改革（土地改归国有，租给农民）的预想结合在一起的”^③。其实，孙中山所主张的民权主义、民生主义，前期虽然有“预防资本主义”的想法并包含了一定的社会主义因素，但主要内容是肯定资本主义政治经济的

① 中国本土有“民本”意识、“平均”意识，没有“民粹”概念，“平均主义”和“民粹主义”这样的概念都是后人的概括。“民粹主义”是一种社会政治思潮，来自于俄国的“民粹派”。民粹派原则上属于主张民主主义革命的平民革命派，但它与欧洲的启蒙思想大为不同，它认为底层民众特别是农民最纯朴也最有道德，是社会的真正基础和良知所在，因而知识分子应当向他们学习；在经济和政治上民粹派推崇农村村社的理想，反对在俄国发展资本主义，具有反智和空想的特点，因而遭到普列汉诺夫、列宁等人的批评。但俄国许多革命者恰是经过民粹派而后成为马克思主义者的。参见《我们究竟拒绝什么遗产》、《中国的民主主义和民粹主义》、《两种乌托邦》，载《列宁选集》第1、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参见马龙闪、刘建国：《俄国民粹主义及其跨世纪影响》，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1、2、3、6章。

② 《列宁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39、648页。

③ 《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24—425页。

发展；而中国其他众多革命者却从农民的利益和道德出发，反对资本主义，这其中的担心就是社会的分裂、道德的堕落和人心的腐化。^①

列宁对民粹主义的批评，对处于民主革命时期中共的高层领导产生了影响，使他们对民粹主义问题有了一定的认识和批评。如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中就特别强调：“有些人不了解共产党人为什么不但不怕资本主义，反而在一定的条件下提倡它的发展。我们的回答是这样简单：拿资本主义的某种发展去代替外国帝国主义和本国封建主义的压迫，不但是一个进步，而且是一个不可避免的过程。它不但有利于资产阶级，同时也有利于无产阶级，或者说更有利于无产阶级。现在的中国是多了一个外国的帝国主义和一个本国的封建主义，而不是多了一个本国的资本主义，相反地，我们的资本主义是太少了。”^②

中国历史文化自身的逻辑和以农民为主体的革命，都未能对这一论断提供强有力的支持，毛泽东和其他领袖人物，大都难以像列宁那样重视现代启蒙的积极作用，也没有真正认识到资本主义的发展对于中国现代化的重要性。新政权建立之后，民主革命的任务似已大功告成，党为社会主义进而为共产主义奋斗的政治使命感和道德意识，与平均主义和民粹主义的社会理想，似乎呈现出高度的一致性，因而也就很容易结合在一起，成为强势的主导性社会意识；上面所说的民主革命时期的两种价值观，也势必为其所筛选；加之国际上美苏对抗的冷战格局的形成与局部热战的发生，使得中共最高领导层特别是毛泽东，必定要将个人意志、党的意志转变成国家意志，推动社会的改造和国家的现代化建设。于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刚刚两年，毛泽东就对“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的提法表示怀疑并进行了批评，执政党就开始了“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原定10年到15年的过渡时期，结果只用了4年时间就实现了把生产资料的私有制转变为社会主义公有制的目标，中国于是从“新民主主义社会”跨入“社会主义社会”，在政治与经济上紧紧地跟上苏联的步伐。“资本主义的某种发展不但是一个进步”、“而且是一个不可避免的过程”的论点，也就跟着“过时”

① 参见李泽厚：《中国近代思想史论》，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313—362、396—412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60页。

了。这应当是人们常说的“急躁”、“冒进”即思想变得激进化背后的原因。然而，正是这一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激进“过渡”，导致了后来更深地陷入乌托邦空想和社会长期的严重失序即我们后来称之为“自我折腾”的状态。

造成这种局面，与价值和价值观问题上的严重失误和偏颇直接相关。与经济上的社会主义改造相配合，执政党的意识形态越来越具有“左”的特点，如提出的以“集体主义”为核心的社会主义道德观，是容不得人们对个人利益和权利的追求的，那属于“个人主义”或“私心杂念”。这种以个人主义为对立面的集体主义，推动并强化了民族国家的建构和社会的重新组织，广大的工人农民和其他政治上可靠的人员，作为高度政治化的“人民”的中坚力量和成员被整合到国家的政治与经济体制之中。不久，这种道德观进一步被凝聚为以“大公无私”、“兴无灭资”为核心的、政治与道德合一的价值观。——当然，这不单是观念的倡导，而是靠政治经济体制与相应的政策来保障的。在这种观念、体制与政策的共同作用下，中国大陆逐步确立起以政治上的阶级斗争和经济上的平均主义为特色的极左路线，直到触及每个人灵魂的“文化大革命”爆发，这种极左路线和思潮的空想性、极端性和虚妄性也得到淋漓尽致的表现：“只算政治账，不算经济账”；“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终于把中国社会推向崩溃的边缘。在这十年间，神化领袖、否定人道主义、宣传血统论、鼓吹读书无用论、认定知识越多越反动，这些最为落后与愚昧的价值观，肆无忌惮地毁灭着构成现代文明社会的、也是真正社会主义的那些最基本的价值：尊重生命、人格尊严、法治、人的权利、自由与平等、知识与科学精神。而由此导致的不止是经济濒临崩溃的边缘，还有民粹主义的进一步劣质化以及人的心灵相当普遍的荒漠化。

回过头来，重新省思那个自我折腾、无法无天的年代，虽然人们似乎能够从来自于“青年”和社会“下层”的“造反”与“大民主”的举动中，从支援世界“被压迫阶级和被压迫民族的革命”的口号和行动中，感受到热血沸腾、激情燃烧，感受到一种追求人类平等和世界正义的价值取向，然而，只要我们将其还原到当时的政治和文化语境中，即在政治上将中国人划分为“革命”的“工农兵”与反动的“地富反坏右”，再加上“叛徒特务”、“走资派”、“保皇派”、“臭老九”和其他需要随时清除的新发现的“敌对”势力和

“异己”分子，在文化上将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特别是儒家文化，和现代西方社会的、苏联东欧的思想文化贴上“封”“资”“修”的标签横加扫荡，那么，我们就不难发现贯穿在上述政治活动中的极端化与盲目性。如果人们处于非红即黑的政治氛围与高压之中，如果人们的心灵得不到应有的——更不必说充分的——滋养和舒展，那么，他们还能够拥有多少属于自己的理性判断？他们的思想意识能够不倒向简单、片面和虚妄吗？本来就接近人的生命本能的情感与意志，能够不变得单面、盲目和偏执吗？理性缺失、情感与意志单一、盲目和偏执，由此结合而成的价值观，会有多大的合理性与先进性？

中国大陆发生的种种的“冒进”和“社会主义的穷过渡”以及后来出现的十年浩劫，以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来审视，就在于我们本来已经处于世界历史进程中，还未能“同整个世界的生产（同精神的生产）发生实际联系”、“获得利用全球的这种全面的生产（人们的创造）的能力”，却要进入“一大二公”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不懂得现代社会主义必须“以生产力的普遍发展和与此相联系的世界交往为前提”、“以世界市场的存在为前提”。这样建立的“社会主义”，当然只能“依然处于地方的、笼罩着迷信气氛的‘状态’”^①。结果，我们一方面通过坚决反对和“打倒”西方资本主义世界而强化自身的统一性和同质化，“军民团结如一人，试看天下谁能敌”，防止社会在经济、政治和思想文化上的分化；另一方面，我们又时时担心外部势力的影响与内部“私有”意识和“修正主义”思想而导致社会分化，于是不断地发动政治运动，直到最终陷入“乌托邦”的虚妄和动乱之中，以“革命”的形式延续了中国传统的“人治”与“治乱循环”的历史。

非常遗憾的是，当时的中国人特别是党和国家的领导者们，对于马克思恩格斯在创立唯物史观时所做的关于世界市场和普遍交往的论述，要么不了解，要么有所了解但未真正理解。由此可知，对于极为重视现实的中国人来说，为了实现现代化，固然需要认真学习和领会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社会主义的基本思想，需要持续地开展关于自由平等的理性启蒙，但最为关键的是在这些思想指导下，向西方和世界开放，实行市场经济，实际地改变人们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由此人们才能在新的实践和新的社会条件下，形成新

^①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86—87、89页。

的观念和文化心理。

现代社会的基本性质和普遍特点是理性和理性化，体现为社会的合理分化与有机整合，体现为社会的法治和契约关系。理性也是现代社会主义的内在属性。马克思在社会主义问题上最大的思想贡献，就是把欧洲历史上的“空想社会主义”，变成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放到首要地位的“科学社会主义”。作为思想方法的科学社会主义，对“社会”和“社会主义”的思考与判断，要求从人们生存于其中的最基本的“社会”事实出发，特别是现代工业生产和市场经济活动出发，来考察和理解整个社会的结构、性质与功能，并由此揭示出它的发展方向与方式。就此而言，科学社会主义既是有着平实而高远“理想”的现代价值观，又是基于理性认识的现代社会理论。作为现代价值观，它固然要传承先前空想社会主义追求人人平等幸福、社会公平正义的社会愿景，但只有将这愿景置于现代社会生产力的基础之上，也是资本主义和市场经济充分发展的基础上，充分吸收现代文明的营养，才能使这愿景本身获得新的内涵与意义，不仅更为丰富和饱满，且能够与现代社会的现实构成一种批判的互动关系。据此而言，在改革开放之前的中国大地上，虽然在社会主义的名义下大力倡导、推行过各种社会价值和道德规范，其中固然不乏对中国历史上和革命时代形成的优良道德的继承，但由于被高度政治化，被空想的或极端的思想观念所渗透和主导，并未普遍地形成真正体现现代社会主义理念的价值观。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高度重视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发展是硬道理”这一著名命题中的“发展”，就是指社会生产力和经济的发展。那么，当代中国现实生活中的主流价值观是否因此体现出“科学”即“理性”的精神了？且让我们看看展现在中国大地上的那些现实的然而却构成强烈对比和反差的画面：“发财”、“发家”、“多赚钱”、“多消费”，中国人过去被压抑而在改革开放后被释放出来的“发家致富”的强烈欲望，伴随着“恭喜发财”的舆论氛围，推动了中国大陆的开发热、下海热和经商热；也就是三十多年的时间，蜘蛛网般的公路铁路纵横东西南北，高楼大厦到处拔地而起，各式各样的私家车已多得无处停放，出境旅游的人数正在跨越一亿人大关，“中国制造”的商品充斥着世界各国的大商场……

毋庸置疑，中国的经济已经崛起，国力日益强大，人民生活大幅度改